

第 一 部 分

经 济 发 展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近期走势*

本文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主要限于 1994 年和 1995 年 其近期走势主要限于 1996 年和 1997 年；讨论现状和近期走势以经济增长率 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作为主要指标。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

1. 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发展一直呈现周期性的波动状态。最近一次经济发展波峰年 1992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14.2% 于是 1993 年上半年出现了高投资、高货币投放、高物价和高进口等经济过热进一步加剧的现象。为了解决经济过热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 1993 年 6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的 16 条政策措施。随着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1993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上年略有下降，为 13.5%；1994 年进一步显著下降到 11.8%；1995 年 1—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 3649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8% 预计全年可达 53045 亿元，将比上年增长 10% 左右，略微超过原定计划 8%—9% 的目标。这些情况表明：1994 年和 1995 年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处于速度扩张的高峰期，而是处于减速的收缩期。这是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特点。

2. 与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头三个经济周期相比，这次经济周

* 本文原载《经济政策与发展》1995 年第 12 期 并录于《东亚经济白皮书》(日文版)

期自波峰年 1992 年以后，经济增长呈现出平稳下降的状态。由 1978 年波峰年到波谷年 1981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依次为 11.7%、7.6%、7.9%、4.5%。由 1984 年波峰年到波谷年 1986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依次为 14.5%、12.9%、8.5%。由 1988 年波峰年到 1990 年波谷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依次为 11.3%、4.3%、3.9%。而由 1992 年波峰年到 1995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依次为 14.2%、13.5%、11.8%、10% 左右。^①当然，1995 年还不是波谷年，预计 1996 年为波谷年。但 1996 年经济增长率不会比 1995 年下降很多。因此，只要把第四个周期与前三个周期作一比较，就可清楚看出：后者经济增长率减速呈现出“急刹车”状态，前者呈现出“软着陆”的状态。

3. 与“软着陆”的状态相联系，尽管与 1992 年波峰年相比 1994 年和 1995 年处于经济增长减速的收缩期，但与前三个周期的波峰年相比仍属经济快速增长年份。1994 年和 1995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比作为波峰年的 1978 年高 0.1 个百分点和低 1 个百分点，分别比 1984 年低 3.4 个百分点和 5 个百分点；分别比 1988 年高 0.3 个百分点和低 1 个百分点。

4.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周期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就第四次周期的情况来看，已经开始出现了快速而又平稳的发展状态。改革开放后的头三个周期存在的那种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的状态，已经开始有了很大改观。

5. 由此又派生了以下特点：显著提高了“八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据初步测算，“八五”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1.7%，比“七五”时期的 7.9% 高 3.8 个百分点，比“六五”时期的 10.7% 高 1 个百分点。“八五”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以往时期，且在国际上也遥遥领先。据统计，

^① 1995 年为预计数。

1991—1994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11.7% 同期世界平均增长 1.9%。按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三年价格调整汇率平均计算，199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5061 亿美元，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之后，居世界第 8 位。1993 年增加到 5811 亿美元，超过了西班牙，居世界第 7 位。如果按 1987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已从 1990 年的 2.3% 上升到 1994 年的 3.2%。我们的综合国力确已大大增强。但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很低。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资料，1993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485 美元，在 132 个国家和地区中居 103 位，属于低收入国家。1994—1995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很高，但因人口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有限。总之，1994—1995 年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步入稳定、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可以说，这是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特点和主流方面。

但也必须看到，中国近两年经济运行中还存在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

1. 通货膨胀率在高位上运行。“八五”前 4 年（1991—1994），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年均上涨 10.8% 其中，1994 年高达 21.7%；1995 年 1—3 季度比上年同期上涨了 16.6%，预计全年上涨 15% 的调控目标大体可以实现。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根本改变高通货膨胀率的状况。而且，通货膨胀率回落的基础很不巩固，这次抑制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运用了行政手段。

2. 中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在某些方面“瓶颈”状况甚至更为尖锐，其中尤以农业发展滞后最为突出。1992—1994 年，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都在 5:1 左右，这远远超过了现阶段工农业增长速度的正常对比关系（一般认为，正常对比关系为 2:1）以致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成为近两年促进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3.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向其他各种经济成份蔓延的势头。在国有经济中，作为粗放经营（或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的重要指标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1994年高达 69.04%；而作为集约经营（或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最重要指标的更新改造投资仅占 30.96%。这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作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最重要指标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竟占 63.5% 其中国有经济建筑安装工程费占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62.7% 集体经济占 56.5% 个体经济占 91.3% 联营经济占 62.1%，股份制经济占 56.6% 外商投资经济占 46.6% 港、澳、台投资经济占 56.3% 其他经济占 81.4%。

4. 与第三相联系，社会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其中，尤以国有经济为甚。1990 年至 1994 年，国有工业企业中的亏损面为 30.9%，亏损额为 482.6 亿元，分别比 1990 年增加了 3.3 个百分点和 133.8 亿元。这还只是账面上的明亏数，如果再加潜亏的企业，则亏损企业约占国有企业总数的 2/3。

5. 尽管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 16 年（1979—1994 年）为社会劳动者提供了 2.2 亿个新的就业机会，但就业压力仍然很大。除现有的几百万显性失业人口外，在公有经济中潜在失业人口多达 3000 万人，农村富余劳力高达 1.2 亿人，1995—2010 年预计年均新增劳力还有 1450 万人。

6. 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不公显得突出。这不仅表现在公有经济中原有的平均主义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而且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少数成员与多数成员间的不合理收入差别过大。此外，城乡居民之间和东、中、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1990—1994 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 2:1 扩大到 2.6:1；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 1.38:1 和 1.63:1 扩大到 1.49:1 和 1.89:1。

二、中国经济开始步入稳定、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

尽管中国近两年经济发展中，存在上述各种问题，但毕竟开始步入了稳定、持续、高速发展的轨道。其原因在于：

（一）改革、开放效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更是系统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这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八五”时期取得了重大进展。①价格改革方面，在商品市场上初步形成了市场决定价格的新机制，要素市场的培育也取得了进展。依据简化税种、统一税率，便于管理的原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初步实行了中央和地方分税的财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体系。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已经初步分离。各类金融市场有所发展。在建立外汇管理体制（汇率并轨，实行结售汇制和改进汇率形成机制等）方面也迈出了重大步伐。国家计划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基础，变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转变到以法律、经济手段为主的轨道上来。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开始试点。⑦社会保障制度、住宅商品化和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也都有新的进展。上述各项改革，特别是宏观管理和市场方面的改革，为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济环境，促进了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增长。

但因国有经济改革滞后于非国有经济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加之国有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等）不合理状况较为严重，以及冗员多和负担重等原因，以致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十分突出，推动国有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如

1994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2669亿元(不变价),比1990年增长106.6%。1991—1994年每年分别增长13.3%、21.7%、22.7%和22.1%,平均每年增长19.9%。但在全国工业新增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非国有工业逐年上升。二者在新增产值所占比重之比,1991—1994年分别为53:47、48:52、42:58、28:72。

相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处于领先地位,加上东部地区在科技和管理、人才以及地理方面的优势,因而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继续保持领先的格局。据统计,“八五”时期以来,在全部工业产值中,东部地区工业生产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61%提高到1994年的65.8%,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由26.2%和12.8%下降到22.7%和11.5%。

但无论是非国有经济的较快发展,或是东部地区的领先发展,都突出反映了经济改革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方面的强劲作用。

此外,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延伸的基本国策——开放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1—199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9.7%,远远高于世界同期4.5%的增长速度。199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367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5%(考虑到统计口径等因素的影响,一般认为约20%),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2.59%。其中,出口额、进口额、进出口总额均居世界第11位。1995年1—3季度,中国进口总额为906亿美元,出口总额为1070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6.2%、34.8%;贸易顺差为164亿美元。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充分显示了开放政策的巨大作用。

1979年至今,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1113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已达3957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进出口总额876.5亿美元,占全国的37%;上缴税款(不含关税)390亿人民币,创造

了约 1400 万个就业机会。到 1995 年第 3 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已达 698 亿美元 比年初增加了 182 亿美元。

（二）经济增长阶段效应

有关研究表明，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结构剧烈变动的新时期，从而形成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契机。上述中国经济开始步入稳定、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正是同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相联系的。

据统计和测算，1994 年和 1995 年，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分别为 9438 亿元和 9548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21% 和 18%。“八五”时期第一产业增加值将达到 21309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9.9% 比“七五”时期下降了 6.4 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21259 亿元和 25992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47% 和 49%。“八五”时期第二产业增加值将达到 84481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7% 比“七五”时期上升了 3.8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为 14308.8 亿元和 17505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31.8% 和 33%。“八五”时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将达到 59381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3.1% 比“七五”时期上升 2.6 个百分点。上述数字也已充分表明，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变化，对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与上述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相联系，投资需求和消费高需求也都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劲动力。

1991—1994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 41748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3% 比“七五”时期上升了 5.8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 37.5% 比“七五”时期提高了 25.7 个百分点。1995 年固定资产投资在 1994 年回落的基础上进一步回落。1—3 季度，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89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6% 增幅回落 26.3 个百分点；扣除投资品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 10% 左右。

1991—199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平均增长 22%，比“七五”时期高出 8.2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上升因素，平均每年增长 10.3%。1995 年 1—3 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418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9.6%；扣除价格上升因素，实际增长 11.1%。

可见，1991—1993 年，社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都是很高的，而且对生产的推动作用又不仅限于这 3 年 还要延伸到 1994—1995 年。1994—1995 年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虽有大幅度下降，但仍然不低。这是近两年经济仍然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发展的条件下，市场需求引导生产发展的传导机制更灵活了。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市场需求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导向作用。比如，“八五”以来的头 4 年 中国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9.3% 和 20.4% 重工业高于轻工业 1.1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到“八五”前期固定资产投资比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的拉动。但是，到 1994 年，投资的增长速度与消费需求相差不多，因而明显改变了“八五”前 3 年重工业领先于轻工业增长的格局。在工业增加值中，轻重工业所占份额之比，1991 年为 42.7:57.3，1992 年为 35.3:64.7，1993 年为 30.7:69.3，1994 年为 49.5:50.5。

（三 宏观调控效应

1992 年，当中国经济过热进一步发展的时候，1993 年 6 月底中国政府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高通货膨胀率是经济过热的最重要标志，这次高通货膨胀率的出现，尽管有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多种复杂原因，但也总是与货币发行量过大直接相联。

就中国具体情况而言，适度的货币发行量主要取决于三个因

素：①保持经济适度的快速增长。社会可以承受的物价上升幅度。货币的周转速度。1979—199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3%商品零售物价年均上涨6.44%，货币流通速度年均减慢4.7%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24.7%这些超过社会产品和劳务总供给的货币发行量的相当大的部分虽已为历年的物价上涨率所消化但也成为1994—1995年过多货币供给量的重要来源。还需指出尽管1993年6月底就开始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取得了成效但1994年货币投放量仍然达到1423.9亿元仅比1993年减少104.8亿元。1995年在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方面继续取得了成效。1995年1—3季度的货币投放量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66亿元；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同期增加15%，回落11个百分点，已低于原定的20%左右的调控目标。但当前货币流通量仍然过大。1995年1—9月，现金加上企业存款比上年同期增长18%；再加上居民储蓄存款，货币供应总量比上年同期增加30.6%，仍然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和商品零售物价上涨率之和。可见，近两年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执行一方面确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并成为促使经济增长“软着陆”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和“九五”时期（1996—2000年）仍需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近两年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在宏观调控方面除了首先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外，还在调节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内容有：①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如前所述，这两年在控制投资需求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效。着力加强基础产业缓解“瓶颈”状况特别是花大力气抓了农业生产确保“米袋子”和“菜篮子”这使农副产品的供求紧张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③调整进出口贸易。如控制国内市场紧缺商品出口，增加农产品进口。加强市场管理，严格控制乱涨价同时控制公款消费大力反腐倡廉。

三、中国经济的近期走势

这里，我们主要通过预测 1996—1997 年经济增长率，来分析中国经济的近期走势。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预测的 1996—1997 年的经济增长率，是指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条件下实现和巩固经济增长“软着陆”的经济增长率。是从现实出发，速度与效益尚不能真正有机统一的非理想状态的经济增长率，即在 1994 年和 1995 年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降的基础上，1996 年和 1997 年进一步下降到 9% 左右。

就当前的情况来说，需要警惕由经济增速下降过快导致市场全面疲软的危险，但更需要警惕经济增长还未实现“软着陆”就出现反弹，从而又一次导致经济过热的危险。这除了国有经济投资膨胀机制和非国有经济投资的盲目性以外，还有下列一些重要原因。①‘八五’前 3 年大规模投资，为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物质基础。②30% 以上的居民储蓄率在近期内不会有多大变化，尚可进一步支持高投资。国际经济环境在这方面也变得有利。据世界银行预测，1996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 3.6%。这对中国扩大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是有利的。

因此，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这首先是继续解决经济过热问题的需要。1995 年商品零售物价上升指数预计可以下降到 15%，但这仍表明通货膨胀率在高位上运行，这是当前经济过热尚未完全消除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要把通货膨胀率降到经济增长率以下，预计还需两年左右的时间。而就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降低经济增长率是降低通货膨胀率的一个重要条件。

再者，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在 1996—2010 年这 15 年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都要以经济的适度增长作为条件。

可见，把这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到 9%左右 既有利于避免出现市场疲软的危险，又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当前经济过热、实现和巩固经济增长的“软着陆”并为进一步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快速增长创造条件。这样，“软着陆”就有了新的含意 即除了在“软着陆”期间使经济增长速度平稳回落，以缓慢地改变经济过热状态以外，还要在“软着陆”后使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但这里所说的平稳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没有波动，而是要改变 1992 年以前多次发生的经济波动幅度过大的状态，使波动幅度逐步缩小。为此，当前需要把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

1. 把进一步实现“软着陆”与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结合起来。这样做，既有利于把速度进一步降下来，又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这方面，当前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方面：①把由过多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及其所导致的作为长线的某些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下来，同时提高作为国民经济“瓶颈”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消除前几年与过度投机相联系的泡沫经济。提高适销对路产品、名优新特产品、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在产品总额中的份额，特别是要大力消除假冒伪劣产品。根据近年来有关部门对我国大陆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大于 0.85 的有 8 个 小于 0.85 大于 0.7 的有 15 个 小于 0.7 大于 0.59 的有 5 个。据有关专家估算，到 1994 年 在国有单位投资总额中 仍有 1/3 用于泡沫经济。据统计，1995 年以来，工业产品销售率一直处于偏低水平，11 月份为 95.55%，是今年以来的较高水平，但仍比上年同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当前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有巨大潜力。

2. 把进一步实现“软着陆”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结合起来。这同样能达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效果。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最

重要标志。为此：

(1)不仅要大力提高技术改造投资总额，而且要大大提高技术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1981—1994年国有经济的基本建设投资由442.91亿元增长到6436.74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66.35%提高到69.04%，更新改造投资由224.60亿元增加到2918.61亿元，比重由33.65%下降到30.96%。该项数据表明：这个期间国有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存在着凝固化倾向。

但如果把考察的视线不限于国有经济，而是转向整个社会经济，那么不仅前者的经济方式是粗放型的，后者也如此。直到1994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比重仍占到63.5%，其中国有经济为62.7%，集体经济为56.5%，个体经济为91.3%，联营经济为62.1%，股份制经济为56.6%，外商投资经济为46.6%，港澳台投资经济为56.3%，其他经济为81.4%。

这些数据说明：基本建设投资比重过大、技术改造投资比重过小，不仅是导致经济过热的最重要原因，而且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由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障碍。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是必须降低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提高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与此同时，要优化技术改造投资的分配结构，把技术改造投资优先并重点用于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以及技术含量多、附加值高和出口创汇大等方面的产品。

(2)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还需提高折旧率，并允许企业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新技术的开发费。在税收方面也要给予企业的技术改造以优惠待遇。

(3)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成果市场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4)适应加快企业技术进步的要求，对外开放方面的政策也要做适当调整。比如，在外贸出口方面，我国已完成了从以出口原材

料为主到以加工产品为主的第一个转变；当前正在实现从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第二个转变。现在需要加速这个转变进程，以此来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又如，中国在直接利用外资方面也开始步入一个新阶段。过去来华投资的主要是经济实力小的小企业，现在有愈来愈多的大企业。前者着眼于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市场；后者着眼于国民待遇，产品主要销在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外资要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并须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原则。

(5)适应加快企业技术进步的要求，调整考核干部的指标。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考核干部业绩的经济指标，实际上主要就是经济增长率。而且这种考核又往往成为干部升黜的依据。这样，在政企尚未分开和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条件下，上述考核干部的办法，便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利益趋动，促使某些有关经济管理干部和企业的主要领导人成为盲目追求外延扩张、增大基本建设投资、上新项目的主要人格化代表。因此，要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把反映集约经营的指标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对有关经济管理干部来说，这些指标主要包括：技术改造投资和购置设备、工具和器具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改建投资以及用于增加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节约能源、原材料的投资在技术改造投资中的比重等。对企业主要领导人来说，这些指标主要包括：新技术开发费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新产品、技术含量大的产品、附加值高和创汇收入高的产品在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等。这些考核指标不仅在政企没有分开、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条件下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就是在政企分开、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实行这些考核指标仍有必要，至少对那些国家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国家控股（或参股）公司仍有意义。

3. 把进一步实现“软着陆”与深化经济改革结合起来。无论

是上述的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或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都要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基础。一般说来，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如果价值规律具备了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就会促使乃至迫使企业采取以技术进步作为特征的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即价值规律“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迟迟不能实现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主要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缺乏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为了创造这个条件：

(1)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塑价值规律赖以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这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依据规模原则、产业原则和行业原则搞活整个国有经济。所谓规模原则，就是抓大放小。对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积极推行公司化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他们成为市场主体。而对国有中小企业则通过联合、兼并、改组、租赁、承包和破产等多种形式把他们改造成由多种经济成份参与的，多种形式的混合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等，使他们也成为市场主体。所谓产业原则就是依据具体情况，国有经济全部介入或部分介入自然垄断性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先导产业、幼稚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至于一般竞争性的产业要尽可能退出来。所谓行业原则，就是有些行业既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又不关系国家安全，但对当前人民生活关系极大，国有经济也必须部分甚至全部介入。当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的情况下，国有经济必须介入关系人民生命的药品行业。贯彻这些原则，既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保证经济的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可以把不适合国有经济经营的那一部分放掉，以利于提高整个国有经济的质量。在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国内市场竞争必将更趋激烈。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勉强保留这一部分国有

经济，势必形成两个后果：①亏损的大量国有小企业必然破产。②如果仍然靠银行贷款的办法来维持，势必酿成更严重的金融危机。事实上，近几年来，通货膨胀率一直在高位上运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大量国有企业（主要是小企业）亏损导致的过大信贷规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货币过量发行。从这方面来说，抓大放小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双重作用决定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是我们必须及早清醒认识，并须争取主动采取坚决措施付诸实施的。而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包括集体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份。改革以来，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样必须清醒看到，由于中国剩余劳动力过多，民间资金充裕，市场领域广阔，社会需求量很大，因而这方面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而且，依据上述前提发展这一部分经济，在增加就业、缓解国有经济的就业压力、分流国有企业冗员，增加国家税收和居民储蓄、减轻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依存度、缓解国有企业资金紧张状况，减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为国有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提供有利条件等方面，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途径，就可以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逐步都成为市场主体和技术改造主体。

(2) 要创造价值规律赖以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为此，要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市场，形成价格机制合理、统一、开放、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

(3) 要坚决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和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以促进上述微观基础和市场环境的形成。

这样，粗放经营方式就难以存在，集约经营方式就会得到较快发展。否则，不仅国有经济中的粗放经营方式难以根本改变，而且这种方式向非国有经济蔓延的势头也难以扭转。总之，实现上述三个结合，就可以在优化结构、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质量和效